

“自然”与“自在”——《尘埃落定》中阿来的生命写作

杨欣悦, 冯光祥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本文以“生命写作”为研究路径, 探讨阿来《尘埃落定》的创作内核。研究发现, 作家与嘉绒藏地交融的生命体验深刻塑造了小说的主题表达与诗性特质。通过“傻子”这一叙事主体的构建, 阿来将个体生命的脉动与族群历史的轨迹相融合, 并赋予自然以叙事主体性与伦理尺度。最终, 作品在“自在”的生命状态与“尘埃落定”的必然宿命, 建构出一种超越单一族群叙事、触及文明兴衰与人类普遍境遇的生命伦理思考。

关键词: 阿来; 《尘埃落定》; 生命写作; 自然; 自在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573

引言

既往的阿来研究, 已在“文化认同”、“生态叙事”、“历史书写”与“跨语际写作”等路径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它们将阿来的文本视为一个意蕴丰厚的客体, 揭示了其中鲜明的族群文化特质、深沉的生态关怀以及独特的汉语诗学。而本文通过“生命写作”这一研究范式的引入, 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文本写了什么”转向动态的“文本如何由作家的生命孕育”, 提供了一种更接近阿来创造源头的理解方式, 它论证了既往研究所析出的诸种主题与形式特征, 并非孤立并列的文学元素, 而是同一生命根系——即作家与嘉绒藏地历史、文化及现代变迁深刻互渗所形成的总体性生命体验——所自然生发的不同美学形态。

阿来认为, 文学的本质是“源于自己内在生命的一次次净化”。嘉绒藏地的历史、神话与现代变迁, 对他而言并非书写的对象或研究的课题, 而是内在于其呼吸、塑造其感知方式的生命经验。他的许多作品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底色, 在真诚袒露自我、倾注深情的同时, 又能超越个体的局限, 抵达关于历史、记忆与人类境遇的普遍性的精神寓言。在其代表作《尘埃落定》中, 这种“生命写作”的实践展现为一部宏大而深邃的文学典范。

一、生命书写: 范式转变与叙事重构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中, “生命写作”早已超越了传统自传的藩篱, 它是一个以自我生命经验为基石, 通过多元叙事与丰富媒介, 旨在“捕捉叙事结构和具体图像中的短暂瞬间和生命进化阶段”的广阔领域。中国学者倾向于用“生命写作”这个术语来针对性地分析虚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真实生命体验与生活情感。小说并非对作家生平的表层摹写, 而是将其在嘉绒藏族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整体性生命体验——关乎一个族群的历史命运与一种文明的内在精神——深度倾注并投射于土司家“傻子”二少爷这一叙事主体之中。“傻子”远非仅具结构功能的叙事工具, 而是阿来复杂生命经验的高度艺术化投射与叙事重构。其形象的深刻性, 正源于作者生命体验与艺术想象的交融。小说中“傻子”特殊的汉藏混血身份, 与阿来本人出生于汉藏交界地带、成长于回藏结合家庭却深刻认同藏族文化身份的生命经历形成微妙呼应。通过“傻子”在土司制度崩解前夕的观察、感悟与抉择,

作者简介: 杨欣悦(2005—),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冯光祥(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阿来实质上探讨了在文化交融与历史转型中个体与族群的身份定位与精神归属。这一人物形象,因此折射出作者深层的民族情结与文化关怀,成为其自我身份思索的文学化身。阿来将自己对藏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体验熔铸到一部部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同时,这种书写又与藏民族文化以“互文”的形式折叠在一起,从而展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藏地,这是阿来创作的初衷所在。

进一步而言,“傻子”所承载的不仅是作家个体身份的关联,更是对藏民族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命运的整体叩问。阿来曾坦言,呈现藏族的文化与精神是其写作的重要初衷。在《尘埃落定》中,这一初衷并未直接转化为文化展示,而是通过“傻子”内视角的独特感知——那种混沌与澄明交织的智慧,对权力、欲望、文明兴衰的直觉性洞察——将嘉绒藏族特定的历史、宗教、习俗与伦理观念,溶解于人物的命运起伏之中。借此,阿来实现了对族群集体经验的生命化书写,使宏大的文明变迁史获得了个体生命的温度与叙事纵深。

生命写作注重叙事主体的内在视角,允许从内外双重角度记录生命经历。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建构,实现了内外视角的交融。“我”既是故事内的角色,也是阿来观察和诠释世界的“代理人”。“我”的感官体验、内心独白直接呈现了生命在特定历史与文化中的鲜活流动。这并非阿来自传的转述,而是将他对于嘉绒藏区土地、人群与文化的身体性记忆与情感结构,艺术化地植入“傻子”的感知系统,实现了生命经验的沉浸式传达。“傻子”看似混沌的叙述,恰恰构成了一种陌生化与同离效果的反思性视角。阿来自身的历史观与哲学思考,正是借由这一“非常规”的叙事声音,获得了自然而深刻的表达,为整个故事注入了一个全知性的、反思性的外在视角。小说是傻子的“自传”,更是阿来为这个虚幻的家族立传,作者是以傻子的个体生命为棱镜,折射整个文明阶段的终结。“尘埃落定”的宿命感,不仅属于“傻子”或土司家族,更属于一种旧秩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宇宙认知模式的必然消逝。写作在此成为对一种文明生命周期的哀悼与铭刻。“‘我’通过‘它’和‘你’,揣度‘它’和‘你’,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整个世界”。阿来以“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的交融,让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尘埃,落定为一部关于智慧与傻拙、人类文明与自然的生命史诗。

二、自然：生命书写的“主体”与“媒介”

在阿来的文学世界中,自然绝非静态的背景或单纯的意象,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和叙事动能的主体性存在。在对生命神性的敬畏中,他笔下的自然不再是人的附庸或叙事的背景工具,而是推动人的力量,作为生命书写的“主体”与“媒介”,深刻参与并形塑了文本的意义结构。

首先,自然意象在叙事中承担着动因性角色,推动情节发展并承载深层主题。“尘埃”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一切辉煌与争斗的最终归宿,其“飞扬”与“落定”的循环形态,更喻示了一种循环论的时间观,奠定了小说宿命论般的叙事基调与意义框架。同时,“小说中的其他意象,例如紫衣意象、地震意象、罂粟花意象等都很好地围绕着‘尘埃’凝聚成一个整体。”“罂粟”意象是欲望的具象化载体,阿来以其种植、盛开与贸易的节奏,掌控着人物命运的起伏。它的引入直接触发土司间的冲突、财富重构与道德失序,凸显自然亦可作为外来的、诱惑性与毁灭性并存的力量,介入并改写人类命运。自然有了自我的灵性,在将人类加之于自身的残暴反馈给人类。此外,“土地”这一自然意象与“官寨”构成对立关系,二者的本质属性与命运归宿截然不同:土地作为永恒且孕育生命的母体,代表自然生命的根基;官寨作为人造权力的象征,最终在炮火中坍塌。

人物与自然的关系实际是阿来评判文明形态的核心尺度。依据小说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可分为三类代表不同的文明立场的人物:敬畏者、掠夺者与共生者。翁波意西作为敬畏者的代表,对山川神灵保持崇敬,代表了行将消逝的、带有宗教神圣性的传统自然观;而以其他土司及汪波土司为代表的掠夺者,则将自然视为无限索取对象,代表了背离自然法则的、不可持续的权力逻辑。居于其间的是“傻子”二少爷这一共生者形象,他成为了自然伦理的化身,与自然保持直觉性的通感与和谐,其行为——如性爱描写中被赋予的自然人性与生命力——彰

显出生命与自然本真合一的关系。从文中的具体例证来看,“傻子”的决策逻辑始终基于对自然规律的体认与尊重。他在边境建立市场而非堡垒,体现一种开放、交换与共生的生态智慧,与土地孕育生命的开放性同构。

在《尘埃落定》的生命书写中,自然既是驱动叙事的结构性力量,也是衡量文明价值的伦理尺度,最终更是理解生命宿命的哲学本体。人类的生命节奏、族群命运与文明兴衰,始终与自然的季节更替、万物枯荣同构。自然不再是客体,而是人类存在的母体与镜像。“尘埃落定”的最终指向表达了一种将人类历史重新嵌入自然史的认识,从而对所谓的文明进程进行了深刻的相对化与再审视。阿来通过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与叙事能动性,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嘉绒藏地的地理风貌,更构建了一个人、历史、文明与自然彼此渗透的复合意义系统,使其生命书写获得了恢弘的史诗性与深刻的现代性反思。

三、自在:生命书写的状态与伦理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创造“傻子”这一叙事主体,不仅展现了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思考,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叙事革命。阿来巧妙地运用了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论述的“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叙事策略。叙述者“傻子”因其智力标签,其观察与判断在故事内部常被他人视为“不可靠”。然而,正是这种脱离世俗理性框架的视角,剥离了利益与成见的遮蔽,使其叙述在揭示生存本质与历史真相层面,反而成为最可靠、最直抵核心的通道。正是通过这种反理性、反逻辑、重直觉的“痴傻”视角,宏大的历史进程得以被重新审视与讲述。那些被精致理性所正当化的权力争夺、欲望膨胀与道德虚伪,在“傻子”看似混沌的映照下,显露出其荒诞的本质。

“傻子”的“痴傻”本质,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在”状态——即生命摆脱外界社会编码与功利计算后,所呈现的生命本然、天真、不假外求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内在的主体性。傻子作为故事参与者既处身故事之中,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外在于故事之外,这样的安排也显示了一种人的“自在”状态,整个故事的发展都依托于这一人物的存在。作为参与者,他的视角被限制在个人的感官与直觉之内,形成一种主观的、甚至带有偏差的“封闭性”。然而,正是这种不寻求“客观”解释的封闭,过滤了世俗成见,反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质的通透理解。这种生命的“自在”,使小说得以打破理性的、线性的历史叙事,转而用一种诗性的、直觉的方式去触碰和言说历史真相。作为叙述者,他的“傻”又赋予其叙述一种天然的反思性与同离效果。他像是在讲述另一个人的故事,用一种平静、甚至略带好奇的口吻描述权力、欲望与死亡,这种语调本身即构成对所述内容的深刻评论。这种“自在”赋予他一种超越世俗规则的感悟力,当众人沉迷于欲望游戏时,他能“理性”地洞察其虚幻与危险。傻子每日要问的:我是谁?我在哪里?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思考,“当一个民族走在旧的传观念分崩离析,一面又百废待兴的道路时,人们一定会认真反思一下自身,提出类似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傻子的“自在”,使其成为提出并承载一个族群乃至人类在历史断裂处的存在性拷问的完美容器。

小说的深层结构,呈现为一条从个体的“自在”通向历史的“自然”的完整逻辑链条。“生命写作”旨在捕捉生命流动的瞬间与阶段,阿来以“傻子”内在的生命节奏(感知、欲望、觉醒、死亡)作为叙事的主轴,土司家族的兴衰、制度的崩溃、时代的更迭被溶解于个人的感官印象与心理时间之中,实现了“历史的结构生命化”与“生命的瞬间历史化”。宏大的历史不再是抽象的背景,而是化为可感知的生命节奏与具体命运。傻子的个人成长史(性意识的觉醒、权力的初体验、爱情的滋味)与麦其土司的衰落史(种植罂粟、边境贸易、军事冲突)紧密交织,他的身体与心灵成为感受历史洪流的最敏感容器,以傻子“自在”的生命状态,能最深刻地映照出宏大的自然伦理与命运。“正是傻子的痛苦和绝望给时代染上了悲剧的色调,给人留下了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悲凉。”通过这个自在的生命主体,阿来将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与自然记忆缝合在一起,生动展现了一个“自在”的生命个体如何在他认可的“自然”伦理秩序中,见证一切终将“落定”的进程。

阿来的生命书写所捕捉的,是“人”与“自然”共通的“自在”状态。他借此建构起一种生命伦理,其核心是对一切生命在历史中如何保持“自在”、回归“自然”的普遍性追问。

四、抵达“落定”——生命书写的自然伦理

阿来的生命书写,最终抵达了一种以“落定”为旨归的自然伦理。这种伦理根植于藏地文化中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并在《尘埃落定》中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处境的哲学观照。阿来的书写深深植根于藏族文化伦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然物象并非单纯的背景描写,而是承载着藏族苯教与民间文化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认识,自然在此非客体,而是自有意志与灵性的主体。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构成了其生命书写的哲学基础,也使他的写作超越了简单的民族风情展示,将地方性的文化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思考,直抵一种更古老的、人与自然共生共感的生存智慧。小说中“傻子”所代表的自然智慧,与“聪明人”所象征的功利理性形成鲜明对照:一切人造的权谋、喧嚣与文明终将如“堡垒”般坍塌,唯有顺应自然、承认生命自在本真的状态,才是最终的归宿与启示。阿来借由一个族群的历史命运,书写了所有生命在时间洪流中的存在、消逝,以及如何在与自然的对话中获得终极启示的永恒命题。这使《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民族史诗,更由此建构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文明与个体的生命伦理。

“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虽然《尘埃落定》主要讲述的故事内容是藏族土司家族的兴衰消亡史与藏地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无奈。但“尘埃落定”不仅是历史的终结,更是一种哲学姿态——“尘埃”象征着一切辉煌、争斗与欲望的最终归宿,一切喧嚣、欲望与纷争最终都将回归自然的本体,这是一种深刻的循环论与生命观。

“我们祈望阿来能在自己扎根的沃土上成长成一株喜玛拉雅山上的檀香树,被世纪的风吹荡起所有的芳香,不求浓烈,只求散发出生命的气息。”

参考文献:

- [1]梁海.“大音希声”——阿来小说的藏地书写[J].当代文坛,2020,(1):88-94.
- [2]贺秀明.西方文论关键词生命写作[J].外国文学,2021,(2):100-109.
- [3]梁海.“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阿来创作论[J].阿来研究,2019,(1):23-25.
- [4]赵树勤,龙其林.民族寓言雪域精魂——论《尘埃落定》的神秘叙事[J].民族文学研究,2006,(1):95-99.
- [5]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J].文学评论,1986,(6):24-33.
- [6]杨玉梅,来春刚.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6):67-71.
- [7]德吉草.文化回归与阿来现象——阿来作品中的文化回归情愫[J].民族文学研究,2002,(3):55-59.

“Nature” and “Self-So” — A Lai’s Life Writing in Red Poppies

Yang xinyue, Feng guangxi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life writing” a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core of A Lai’s novel Red Popp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deeply interwoven with the Jiarong Tibetan area, profoundly shapes the novel’s thematic expressions and poetic qualiti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iot” as the narrative subject, A Lai integrates the pulse of individual life with the trajectory of ethnic history, endowing nature with both narrative agency and an ethical scale. Ultimately, within the self-so state of being and the inevitable fate of “dust settling,” the work constructs a reflection on life ethics that transcends a single ethnic narrative and touches up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human condition.

Keywords: A Lai; Red Poppies; life writing; nature; self-so